

■ 印尼：一患者

现在已经是第七天了，有点咳嗽，有点感冒，味觉好像是有失去一些但分辨不出，嗅觉呢，就完全没有了。

头一天发高烧，头疼、肌肉酸痛、想吐、吃不下东西，我只吃连花清瘟胶囊和发烧药，到了晚上，头就像要裂开了似的，体温也一直上升，心脏越是跳得不成规律，那真是噩梦，连想都会让我畏惧(我一般发高烧都会这样)。到了凌晨四点我才不知不觉睡着了。

第二天去做检验，使用的是鼻液拭子采样，结果是新冠病毒阳性。我很淡定，心底早就有数了。把消息告诉几个好朋友，魏老师帮我找附近的宿舍，张老师就马上给我送药物，还有很多水果，真是好兄弟啊。那时已经是傍晚了，宿舍找到，次日才能搬出去。当天晚上吃了张老师的药，想吃水果，但吃不下。我知道，晚上，又是跟病魔拼搏的时刻了，果然发烧、头疼、反胃也都来了，药性也发作了，我又受尽人生折磨，几个小时，这次没那么严重了，好像是吃对了药吧。到了半



七日病录

夜我的烧已退，头疼也快要完全消失了。有点大病初愈的感觉，于是起来削苹果，还吃了一整颗呢。

第三天我就搬出来了，我已无大碍，没有发烧，没有头疼，第一天有的症状早已完全不见了。有的症状：咳嗽，味觉上只是觉得有些变异，我尝得出酸、甜、苦、辣、咸，但有时候一些说不上来的味道却尝不出来。买吃的叫gojek，拿到吃的就锁在房间里。我的好兄弟张老师送果汁来了，一些药物，一些生活用品，他还在电话上跟我讲一大堆医学理论。可惜了我这位兄弟却偏偏坐上了教师这条路。

第四天味觉还是有异常，嗅觉就开始消失了，什么香啊、臭啊，都嗅不出来。就是这么神奇，我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味道的

世界，我已不知我身上那汗液的臭味和洗过肥皂的香味有何不同。症状：咳嗽还有感冒。

第五天，还是咳嗽感冒。还是没有嗅觉，吃饭、吃菜完全是靠记忆力里味道所想象出来了，似乎就是那个味道，配上那种口感，嗯，真不错。那种香葱的香味，那种被炸得很香很香的大蒜。应该就是这个时候吧？

第六天，咳嗽和感冒，味觉还没有恢复，嗅觉完全没有，舅妈寄过来一些补充剂，水果，还有柏树油、四季油。她叫我把我烧开倒在皿器里，然后将柏树油或四季油滴进去，然后熏在我脸上，吸那个蒸汽，哎呀这辣得我鼻洞立马打开，但我还是不知这柏树油什么味，会不会过期啊？柏树油那么重的

味道，就算滴了一点就能熏死整个房间的蚊子的，怎么这什么味道都没有啊，我已经很久没有问过柏树油的味道了，我已经忘了那个味道，所以我想不出来。

第七天也就是今天，咳嗽感冒好很多了，估计明日就会好。现在只剩下味觉还是有点失常，还有嗅觉还没好转。失去嗅觉带给我最大的苦恼不是吃饭时不知道菜的味，而是吃饱饭后，把剩下的菜放菜还能不能吃，菜放久了会坏掉，会发出臭味，但这叫我如何察觉？嗅觉不通，味觉又靠不住，所以很苦恼，到底是吃呢？还是扔了？今日张老师又给我带来果汁，还有susan老师给的清肺排毒汤和冬瓜汤。还是热热的呢。真的很感谢。

这七天里，就是这样，不无聊、不孤独、不寂寞。因为我有一群亲戚朋友在我染上新冠肺炎时，一直给予我鼓励及帮助，首先就是我的好兄弟张老师，天天送果汁，送药物，慰问病情等等。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就是再世的宋公明“及时雨”啊。总是

及时赶到给予最需要的帮助，谢谢你兄弟。魏老师，只要我一开口她就立马行动，谢谢你那晚帮我找晚餐，谢谢你帮我完成我的一份工作。还有舅舅、舅妈、表哥、Edy、也帮了我不少的忙。谢谢Susan老师愿意与我分享治疗药物及方法。谢谢所有的人对我的关心，我答应你们我会快点好起来的，你们不用担心了，我看再过许日也就康复了。谢谢你们让我在生病时间赶到那么温暖，那么幸福。谢谢！

我也想借此机会分享个人想法，如果发现自身有异状，不妨去做个检验，如果是阳性，那就早日隔离，隔离是为了不把病毒再从我们身上再分出去。得到结果后不必惊慌，淡定，坦然面对就是了。要多喝水，坚持吃药、补充剂、水果，身体营养要调好，早晨晒太阳，室内做运动。等康复了做个检验后才可以见人，也要少见人，少出门，戴口罩，常洗手，保持距离。不要让在乎你的人担心你，不要让你在在乎的人让你担心，更不要让别人担心的人受到伤害。

希望大家都能平安无事，一起加油吧！



漫画 张进培(原载《联合早报》)

■ 廖省：林越

大马疫情中的“白旗黑旗”

地处东南亚的马来西亚(Malaysia)，在英国扶持下于1957年获得独立，由亲英的东姑出掌首任总理。匆匆60年，在巫统掌权下的马来西亚，政争不断、经济平庸、贪污横行。终于在2018年，对执政党失望的民众把多数选票投给反对党，造成大马的“改朝换代”。

胜选的“希望联盟”背负人民的期望，推举出身“巫统”的前首相、93岁的马哈蒂尔出任总理。可惜他仍沿用巫统的老一套，排除异己、背信弃义，而经济却始终搞不好。2020年2月24日，马哈蒂尔向最高元首递交辞呈。“希望联盟”安瓦尔表示，他被马哈蒂尔阵营和自己所在的政党成员所“背叛”，并毁约阻止他接任马哈蒂尔的总理之位。

大马民众没等来政坛靖和、经济腾飞，却惊现新冠肺炎。受疫情折磨一年多，看着政府手足无措的封城及乌云密布的抗疫前景，从疲惫转向愤怒；因疫情及封城行动导致众多商店倒闭及高涨

的失业浪潮，让不少失去经济来源的民众陷入迷惘、难以温饱的困境。

《亚洲周刊》刊登林友顺《大马疫情呐喊黑白旗并举》的评论：“无助及绝望迫使民众高挂白旗求助，而因抗疫行动拖延太久及对政府无能的失望，点燃了民众的怒火，纷纷线上高挂黑旗宣泄不满，并要领袖下台。这种线下白旗求助、线上黑旗抗争两股运动同时发动的情况还是首次在大马出现。”但员警总部官员称当局可以援引法律调查参与者。

网民@wanly_sd写道：“我正为这场运动尽一份力。我累了……我们厌倦了这个政府！”@murhanisah_发推文：“在这个未被选中的政府造成这么多伤害后，我不认为这是发声的最佳方式，现在唯一的选择是高举#BenderaHitam及#Lawan。”某网民穿上全黑的衣服、抗疫前景，从疲惫转向愤怒；因疫情及封城行动导致众多商店倒闭及高涨

原，虽然民间出现的是零星行动，没有领军人物，但很可能酝酿成群众争取政治改革的巨涛洪流。

黑旗反映人民的愤怒，白旗突显人民的无助。许多快走投无路的民众没等来政府的资助，只好在家门、窗前挂起白旗，向社会求援，希望三餐不继的家人能有食物。消息在社媒传开后，白旗遍地开花，民间组织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不分种族为挂旗的家庭提供食物，为在疫情中苦撑的贫困家庭，带来一点温暖，以及克难求存的希望。

不过，执政成员党却把白旗运动视为洪水猛兽。吉打州务大臣沙努西说，州政府不会帮助那些挂白旗的人，指责是政治宣传，让人们认为政府应对疫情失败。政客聂阿都认为目前困境是上苍考验，别教民众“举白旗认输”，人民应举起双手上苍祈祷以通过考验。

大马是民风保守的国家，尤其是土著民众饱受

封建传统的灌输和桎梏，导致男女平等观念仍相去甚远，歧视女性的事件罄竹难书，甚至在校内也时常发生，令人发指。2017年，巫统党籍议员沙布丁在国会发表“先奸后娶”论，认为“女孩若能嫁给强奸她的人结婚，她未来的生活不会一片漆黑。”代表了大马落后的观念，被世界女权运动所不齿。

而“童婚”是另一个严重课题，法令规定男性最低结婚年龄为18岁，女性16岁，未达法定年龄者可向伊斯兰法庭申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马代表指出，全球的童婚现象减少，但大马却呈上升趋势。令人气馁的是，负责保护女性的部门在童婚课题上毫不作为。2019年，副首相兼妇女部长旺阿兹莎表示“童婚无法证实犯罪”，被指变相放任童婚。

《星洲日报》刊登马新社前主席阿兹曼的文章，建议马来西亚政府大学应委任非马来裔当校

长。他指出，大马有至少20所政府大学，也有许多杰出的非马来人学者，但他们几十年来备受歧视，从未受委出任大学校长，能当副校长的也屈指可数；导致许多非马来人学者到海外寻求更美好、更公平的前途。目前大马有五所政府大学出现校长空缺，当局应委任一名华裔和一名印度裔出任校长。大马若不想选贤任能，十年后恐怕还在原地踏步。

回顾1963年9月，马来西亚国父东姑反复权衡后，宣布马来西亚联邦、东马沙劳越和沙巴两州、新加坡自治区合并为统一的马来西亚。1964年举行联邦大选，新加坡李光耀角逐竞选，与吉隆坡的关系迅速恶化，同时新加坡爆发严重的种族骚乱。1965年5月召开的马来西亚联邦国家议会上，巫统的马哈蒂尔率先发难，矛头直指华裔族群。为保持马来人对政权的掌控，东姑决心把华裔主体的新加坡踢掉。1965

年8月9日，马来西亚议会以126票通过宪法修正案，即刻将新加坡逐出联邦。新加坡被迫在困境中宣布独立。

56年过去了，如今新加坡和大马的综合国力已在不同的层次上，新加坡因廉政、重视人才大步迈进，而大马却仍囿于党群权益、妒贤嫉能、昏庸保守而竖起“白旗黑旗”。



江春书法作品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忠心的猴子》电影海报

在2009年出版的《1900年至1950年爪哇电影史选集》中，著名印尼电影史学家米斯巴·尤桑·比兰(Misbach Yusan Biran)写道：从1926年到1949年，印尼虽然已有了本土电影，但这些电影制作毫无民族意识的背景，故不能归类为印尼电影。他声称乌斯玛·伊斯迈尔(Usmar Ismail)的《鲜血和祈祷》(1950)才是第一部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电影，应该称作是印尼电影史上的起点(2009:45)。我们在一篇

华人电影作品中的“印度尼西亚” (1)

■ 夏洛·史迪亚地(Charlotte Setijadi Dunn) ■ 汤姆斯·巴克(Thomas Barker)

纪念印尼电影60周年的报刊社论中，也看到这种将乌斯玛·伊斯迈尔的《鲜血和祈祷》奉为印尼电影业师祖的观点。一位名叫诺法·凯利尔(Nova Chairil)(2010年)的影迷写道：印尼需要把3月30日定为国家电影节，因为这一天诞生了一部由印尼本地人导演、制作并在印尼取景的电影。

我们认为，比兰和凯利尔的说法是建立在狭隘的“印尼电影”的定义之上，实质上是对印尼电影丰富性的匮乏化行为。事实上，努山达拉的电影历史并非起始于1950年，而是可以追溯到更早20年。1926年，英国人和德国人制作了《忠心的猴子》(Loetoeng Kasaroeng)，这是一部取材于西瓜哇传说的无声电影。之后，一些华人，既有土生华人也有新

客华人，继续进行电影创作，将民间故事改编并搬上银幕。其中最为杰出的是来自上海的王氏兄弟和本土电影制片人郑氏和陈氏(The Dan Tan)，两人均为影院老板。1942年前，电影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1941年就出产了30部电影。日本人的到来，结束了华人电影迅猛发展的时期，并湮灭了华人电影在历史中的影响。1945年独立之后，随着本土电影制作人的出现，华人在早期扮演的先驱作用逐渐被人遗忘，甚至完全不为人所知。

正如克里希纳·森(Krishna Sen)所言，“觉醒的、爱国的本土电影制作人”(2006:173)的出现，导致人们对印尼电影史的理解产生偏差。在这些本土电影制作人当中，最为著名的人物是乌斯玛·

伊斯迈尔。他的电影《鲜血和祈祷》从指挥官的角度，讲述了西利旺义(Siliwangi)从东爪哇移师西瓜哇的故事。这部电影不仅反映了“民族性格”(Biran, 2009:45)，导演还声称其电影制作“没有掺杂任何商业因素，是纯粹的理想主义”(Ismail摘自Saide, 1991:51)。因此，《鲜血和祈祷》一直被当作印尼电影的范本，集民族主义、理想主义和土著文化于一身。时至今日，这种从意识形态对印尼电影抑或普遍认知的民族电影的定义，依然在印尼电影史构建中占主导地位，导致非土著电影制片人在独立前所制作的电影遭到边缘化的命运。

对于本应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民族电影来说，最大的诅咒确实是商业电影。这种电影很容易

令人联想到娱乐和逃避现实的香港和好莱坞风格。在广为人知的印尼电影史中，华人电影制片人被指引入和维持了这种商业模式，或者如沙林·赛益(Salim Said)所指的是电影业的“原罪”(1991 [1995]:22)。阿斯卢·沙尼(Asrul Sani)于1991年指出：

毋庸置疑，印尼的电影制片人仅仅是那些只考虑口袋而不考虑质量或无意于精品创作的人。可以说：他们全部都是华人(1997:302)。

这种思维方式将华人电影制作等同于商业行为，而非民族电影制作。更为严重的是，当华人电影制片人真正尝试将当地文化和故事搬上银幕时，这部电影又被贴上“机会主义”的标签，“没有理想主义情怀”，以及

“东拼西凑”的故事情节与画面(Biran, 2009b:68)。

印尼电影史的最大空白，就是至今仍没有资料提及华族电影制作人在印尼电影业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尽管许多印尼电影史专家都认为华人在资金方面的贡献对印尼电影的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华人在经济角色之外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这种文字记载的缺失在很多方面都令人深感诧异。华人投资人和电影制片人作为本土电影的制作奠定了基础，并且从20世纪20年代起一直努力繁荣电影业，一直持续到1942年日本占领时期。当时，大多数华人生意都被逼关闭。新秩序统治时期的政策逐步将华人排除在外，从而使他们在印尼历史中的角色也日渐模糊(详见Coppel, 1983; Suryadinata, 1992)。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